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理性利益」與「感性認同」為晚近政治學中兩個不同的理論取向，人們不論是私生活領域中的行為或是政治社會公領域中的公共行動（特別指向政治行動），往往都同時受到感情價值、和利益物質所推動，而且這兩個行為動機經常混雜難辨（吳乃德，2005），而此在兩岸經貿關係結構中又是如何？本文試圖對此尋求理解。

本章主要分為兩個部份進行，第一部份將對「理性」與「感性」的相關理論進行整理爬梳，而在第二部份則就「理性」與「感性」在兩岸經貿關係運用上作出具體概念的陳述。

第一節 理性與感性

諸政策議題的立場態度研究中，吾人可以發現兩種不同的解釋途徑，即「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theory)與「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Sears (2001) 將政治行為或政治態度區分，把基於理性抉擇來解釋政治行為的相關文獻歸類為「自我利益」(self-interested)；而將因為情緒、認同等情感面向上而動員或喚起的政治行為或政治態度稱之為「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其認為個人心中都存在著「象徵政治」，而這些「象徵政治」的作用，對於個人的政治作用或政治行為具有直接的影響力，往往壓倒理性計算的考量。而部分「理性選民」不外乎就是一群以「理性抉擇」為理由來包裝或合理化他們基於「象徵政治」影響而做出投票抉擇的選民（徐火炎，2004）。

理性選擇理論基於「自利」(self-interest) 與「理性」(rationality) 的人性假說 (assumption) 循著演繹邏輯研究政治現象，理性選擇學派假定：人是理性的個體，將有意識的計算以最小的成本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self-interest

maximization)。換言之，理性選擇理論強調人在政治活動中是有理性的，會在若干行動方案中選擇較為有利的方案，而在這種前提下，對於選擇起決定作用的將在於選擇策略以及選擇時所依賴的知識和情報。在議題態度的決定上，選民將觀察政黨或候選人在不同議題上的立場與自身對照，從中選擇一個最關照自身利益者而決定支持或表態。

在投票行為研究中，學者們將抽象的議題立場和議題立場差異放進假設的空間模型之中，以議題空間中的位置、距離長短或方向加以計算選民形成投票抉擇的選項以及各種政黨的競選策略。理性選擇途徑著眼於民眾是否會因為自利（self-interest）而支持特定政策或是採取政治行動？從 Downs（1957）以來的觀點是認為民眾接受特定偏好以增進其個人利益並投票支持採取相同觀點的候選人或是政黨。

Hardin（1995）在討論理性抉擇與認同間的關係時，認為群體認同是經協調整理出來的，並且依據自我利益（self-interest）來決定。個人對某個特定團體認同或者提供服務的前提是，個人奉獻時對自我利益造成的損失可以從其認同的團體得到彌補或更大的利益好處。而所有對國家族群等團體關係的認同（identification）及奉獻（commitment），皆可歸因於某種程度上的自我利益為主的誘因。個人對群體的認同並非原生的，也不是因為對群體利益的關心超乎個人自身利益考量而去認同該群體，而是因為感到認同是有利的。¹換言之，任何認同的選擇都是深思熟慮後的行動，或者說是有目的的行動，同時個人因為他們在群體生活中所認知到的利益，進而創造出對該群體的認同感，認同實乃是利益彙集，而非是預存的或是透特定歷史境況下共同的社會化過程而得。

而與此相對的則是則是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理論。Sears 和 Funk（1991）認為，自利行為是一種目標導向（goal-directed）的行為，自利必須滿

¹ 在 Hardin 的論述中，其認為個人之所以產生認同或做出奉獻往往肇因於他們發現到那些強力認同的人總是能獲得好的地位，抑或是因為所認同的群體可以提供他們相對安全舒適的環境等。詳可參閱 Hardin（1995:16 & 41-42）。

足幾個要件，即利益是中短期的、且是關於物質性的、並且利益是關於個人自身的。換言之，利益是侷限在物質上的，撇開自私或貪婪之類的形容詞，強調以自我為主要考量的以及物質需求層面上的、短程或中程因素。而理性計算是一種極大化個人利益的手段，同時極大化個人利益本身就是理性行動的誘因，但此並非是能影響民眾議題立場態度的常態。其更不諱言的指出民眾對公共事務的認知與私人經驗是無法相連結的，即認為人們對個人情況的判斷與對公共事務的判斷是相互獨立的。

以「象徵政治」一詞進行研究最知名的學者，首推 Murray Edelman (1964, 1971) 之研究。他認為，一般大眾憂慮其所處環境充滿威脅且複雜卻無力改變，因此，他們藉著依附一些由政治菁英所提出的政治迷思或是儀式等政治符號，來簡化複雜的政治世界，並減緩其內在焦慮與不安。政治菁英藉著提供一些政治敵人、團體認同或是對領袖的依附，減輕一般民眾的壓力，並將其精力，轉而投注到群眾暴力或是政治順從。所謂象徵政治的解釋途徑後來由 Sears 等人 (1979, 1980) 發揚光大，藉以解釋選民對公共政策的態度以及政治行為。

Sears 等人 (1979) 所定義的象徵政治，強調的是早年社會化時所形成的，具有情感成分且是符號性的態度。當民眾在成年以後遇到重事務或是需要採取政治行動時，以一些政治符號，像美國的族群融合 (integration) 或是「黑人」(blacks) 等這類存在已久的符號，來啟動如族群態度或是偏見等「既有的政治定向」(predisposition)，而做出習慣性的反應。民眾對於議題立場態度將決定於其成長過程中已然形成的既有的政治定向，²外來資訊內含的相同符號將喚起 (evoke) 並觸動 (activate) 個人記憶中相同的符號節點，此間過程是情感反射且無意識的。(Sears, 1993; Sears & Allen, 1984; Sears & Funk, 1991; Sears & Kinder, 1985; Sears & Lau, 1983; Sears, Hensler & Speer, 1979; Sears, Lau, Tyler & Allen, 1980;

² 就美國而言，既有的政治定向 (predispositions) 包含了諸如政黨認同、政治意識型態 (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種族偏見等。詳可參閱 Sears (1993:120)。

Sears, Tyler, Citrin & Kinder, 1978)。

象徵政治強調的是政治社會化的理論，來自於個人自幼成長以來養成的觀念及認同，因此象徵政治是人各互異的。其認為個人在青年時期所形成的特定政治傾向相對穩定，如民眾的政黨認同以及族群態度，而這些態度對成年時期政治態度會發生影響。且以認知協調理論 (cognitive consistence theories) 觀之，成年的態度會與早年的政治態度相符。

Sears 等人 (1979 : 370) 檢視過去有關自利的分析，他們將其區分為三種研究方法。首先是以總體資料為分析單位，檢視總體層次的經濟相關數據的變動與總統會是國會選舉的得票分佈。例如，看總體的經濟成長率或是失業率分析執政黨在選舉中的表現。其次，則是以個體資料分析個別團體成員與跟該團體成員有利益相關議題上的態度分佈。例如，看個別女性在與女性相關政策上態度。第三則是對個人有直接影響的議題，對其行為或是態度的影響。例如，當政府要採取或是削減特定福利政策支出時，檢視與該福利政策變動切身相關者的態度與行為。不過，上述三種研究結果似乎並未支持「自利」對民眾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

Sears 等人 (1980 : 670-672) 比較了選民的短程自我利益考量(short-term self-interest)和長久以來的象徵認同表態(longstanding symbolic attitudes)二因素如何影響其對政府政策所抱持的態度。研究發現選民的種種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皆鮮少影響到其對某政策的支持與否，個人利益並無法在開創某項公共議題或者主導公共議題等方面上起作用，諸如利己主義 (privatistic personal values)、視政策內容為國家重要議題、認為政府是必需回應民眾需求的機制以及關心施政效度等這些可能使個人利益為導向的政治立場成為主導力量的條件上。相反地，具象徵政治表態(symbolic attitudes)，如自由或保守的意識形態(liberal or conservative ideology)、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以及種族偏見(racial prejudice)等要素，反而是成為選票與政策支持度的主要因素。

然而其研究同時討論了理性利益與感性認同彼此相互影響的可能性。換言之，象徵政治是否亦屬於某種程度上的個人利益考量，其討論結果發現，當孩童幼時的象徵政治形成過程中，個人利益能介入的可能性是極低的，而且象徵政治的養成需要時間，政黨認同亦然，所以長期養成的象徵政治並不容易受到短程的個人利益誘因而產生巨幅變化。因此，若將「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當作各自獨立的變項而運用於檢視議題態度立場的模型上，將可視為合理的推論。

在本節中，吾人討論「理性自利」與「象徵政治」的理論基礎，發現就「理性自利」而言，其主要內涵在於物質需求層面上的、透過理性計算自身條件、是短程或中程因素、相對於「象徵政治」是容易變動的。而就「象徵政治」而言，其主要內涵在於情感認同上的、是習慣性的「政治定向」，自幼長期養成之因素，是相對穩固的。而 Sears 等人以「自利理論」與「象徵政治」兩套模型檢定美國政治上諸多議題，³得到的結果發現象徵政治的影響確實相當顯著，然而若以此觀諸兩岸議題上則此兩組概念的作用又將如何？據概念，作者將在下節討論「理性」與「感性」在兩岸經貿關係中的實際運用。

³ 諸如巴士政策 (busing)、就業保障、全國健康保險、社會秩序等爭議議題 (Sears & Allen, 1984 ; Sears, Hensler & Speer, 1979 ; Sears, Lau, Tyler & Allen, 1980)。

第二節 理性與感性的概念運用

「理性」與「感性」將如何運用於兩岸經關係上，是一個相當值得持續討論的主題。在台灣政治競爭的空間分析中，「社會經濟正義」與「國家認同」是政黨競爭策略上的兩個重要面向（Chu, Hinich, & Lin, 1996）。兩岸經貿擴張過程所形成的利害關係成爲新興的政治議題，與傳統的認同議題在政黨選舉競爭過程中號召動員。另一方面，一直以來台灣社會沿著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這條線而分裂。族群身份認同在 1980 年代以前一直扮演著支持民主運動動員的力量，但當台灣走向民主化之際，在形塑島嶼上的政治競爭時，國家認同卻遠比族群認同顯得顯眼許多，當兩岸的分離短期內沒有辦法輕易解決，則國家認同的議題仍將是重要的政治議題（Hsieh, 2005）。

耿曙、陳陸輝（2003a）在分析兩岸經貿互動下的政治效果發現，兩岸互動的確影響台灣的民意結構。其從「經濟利害」入手，經由「地域代表」制度的轉化而體現各區域的「政治傾向」之研究途徑，可將之類歸爲服膺「理性」層面之著作。其關懷「經濟利益」對政治態度所造成的結果，充分掌握了「社會經濟正義斷裂」影響「政治競爭」此一面向，但在「認同層面」的討論卻似乎略顯不足，其未處理「認同」對於主體進行選擇時造成的「限制框架」。

而吳乃德（2005）討論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時發現，過去的十年間中國民族認同穩定衰退、台灣民族認同勃興並趨於穩定。然而就「此時此地而言」儘管面對彼岸強大的物質利益拉力，感性認同的吸引力目前則仍佔上風。在「台灣民族主義者」、「中國民族主義者」以及「實用主義者」三類台灣民眾中，⁴對於當前「實用主義者」爲最之現象，其主要解釋則在於處於全球化趨勢下，物質與制度的滿足可能遠比認同重要，當然更不排除這樣的情況是由於處於兩岸複雜環

⁴ 此分類方式是將「如果台灣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維持和平的關係，請問你是不是贊成台灣獨立？」以及「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致相當，你是不是贊成中國統一？」聯立處理。同意第一個問題者而不同意第二個問題者爲「台灣民族主義者」，而同意第二個問題但不同意第一個問題者，爲「中國民族主義者」，對於兩個問題都同意者則定義爲「實用主義者」。

境中，這些人暫不願意在兩個民族認同之間作抉擇。其言下之意則是認為台灣由於特殊的歷史情況，造成原有的中國民族認同衰退，新的感情認同需要時間建立、尚未普及。吾人將之歸類於以「感性」論述為主體之代表佳作。

上述兩種不同的研究思路給予吾人深刻啟發，當政治態度深受「理性」與「感性」因素所推動，台灣面臨來自國際產業競爭壓力而採取外移策略，產業外移地主國不僅是經濟競爭對手中的後起之秀，同時身兼具有威脅國家安全的雙重身份。則台灣民眾面對利益與情感交織的兩岸經貿交往議題時，「理性」與「感性」因素則又將如何表現呢？

在面對兩岸經貿日益依賴的條件下，民眾各自理性盤算經貿交往的結果將會為己來收益、機會、或是損害；另一方面，台灣民主化經驗所養成的「政治定向」亦將拉扯著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往的感官神經。據此，吾人認為民眾所持之兩岸經貿交往立場將在「理性」與「感性」這兩條軸線上展開。

然而不同於吳玉山（1999）的架構在於，作者認為其在「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這條軸線上，安全利益並不純然作為理性選擇的判別而存在，其內含了感性認同的因素，換言之，安全利益是否能與經濟利益作一個二分的對立，的確存有討論的空間。⁵相對而言「安全利益」源自於彼我（或敵我）意識的產生，兩岸分隔五十餘年來在國際空間爭奪上的恩仇、對岸「一個中國」的強硬訴求、國際空間上打壓台灣、以及武力嚇阻戰略所營造的高壓負面印象，在相當程度上將其視為「感性」因素，似乎反而更加妥當。

根據 Hardin（1995）的看法，其認為群體認同是經協調整理出來的，並且依據自我利益（self-interest）來決定，個人對某個特定團體認同或者提供服務的前提是，個人奉獻時對自我利益造成的損失可以從其認同的團體得到彌補或更大的

⁵ 吳玉山（1999）在文中曾對此疑點做出說明，其基本同意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是有可能相容的，但假設認為與中國大陸交往確實會帶來一定的安全風險，因此台灣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在面對中國大陸實是難以兼得的，再者，與中國大陸進行經濟交往將會為台灣帶來安全的危害也是一種普遍流行的看法。

利益好處。換言之，理性選擇的主體在於個人「有意識」的認知該行為將有利於己為準則，當認知有利進而支持或表態，是眾所支持理性選擇理論的學者們所大聲疾呼的，因此「自評利益」在影響兩岸經貿交往立場的因素上，無疑是相當重要的。

「階級」屬於社會生活的結構，往往多元而且豐富，其雖未必須以某特定面向一如收入、財富、生活條件、社經地位、職業聲望等條件為代表，但可以確定的是，「階級」必然深深植根於政經地位與歷史脈絡之中（耿曙、陳陸輝，2003b）。儘管階級利益對政治參與的影響並不彰顯，同時今日島內階級間的經濟衝突尙屬罕見，但「階級劃分」多傾向反映「市場經濟」地位或反映「職業聲望」結構，因此筆者沿用西方的「階級」概念，重新劃分台灣的階級組成，並仍將之列入理性因素檢視。

「經濟區域」為反應貿易往來之主要載體，而兩國間貿易利得或衝擊，將相當程度反應於不同經濟區域的民眾在政策立場上的差異。耿曙、陳陸輝（2003a）分析兩岸經貿互動的政治效果中，發現兩岸交流獲利的區域（北台灣）傾向主張「擴大交流」的泛藍勢力，而因貿易與投資轉移備受衝擊之區域（南台灣）則投身泛綠懷抱，兼容獲利與衝擊的中台灣以及孤處一隅的東台灣對於「兩岸交流」則表現複雜矛盾與事不甘己之態度，並呈現較分裂的政黨支持。台灣四大經濟區域各有所屬，因此，將之運用於兩岸經貿交往立場中，檢驗不同經濟區域的民眾對於兩岸經貿交往立場的差距，相信將是一個必要的作法。

在「部門利害」方面，兩岸經貿交往將對台灣不同部門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經貿往來同時帶來利潤與損失，由於「得利」與「受損」的對象通常不同，其一手造就了「贏家」，卻也一方面製造出「輸家」（Shafer, 1994：22-48），若各部門對於利害的認知得以聚合共識，則相信「部門利害」可望成為影響民眾對於兩岸經貿交往看法的重要指標。

最後在「競爭能力」方面，「年齡世代」與「學歷階段」皆代表著競爭能力的強弱。普遍而言教育程度乃是作為個人經濟收益的基礎指標，同時左右民眾得以接收政治知識或政治訊息的強弱能力，並影響民眾對政治事務的判斷。再者，知識經濟時代來臨，學歷階段的高低乃為競爭能力的基本要件，教育程度愈高表示個人掌握「學習」的能力愈強，當然相對於低教育程度的人而言競爭能力也就愈高。而「年齡」則是影響工作精力、記憶、判斷以及反映能力的重要因素，普遍而言，成年之後年齡愈大者其工作機會則相對愈低，再求職所需付出的成本亦相對較高。因此根據上述理由，作者將競爭能力視為影響兩岸經貿立場的理性因素之一。故在理性層面的運用上，吾人認為「自評利益」、「階級劃分」、「經濟區域」、「部門利害」以及「競爭能力」等變項皆可視為理性面的重要因素。

而在感性層面的運用上，就歐美社會而言，除了因政治上左右意識形態差異，以及衍生出對於政黨、政治人物的特定情感外，圍繞著種族所衍生的不同政治評價或偏見等多半皆為政治情感的主要內涵（徐火炎，2004：5）。然而在台灣，政治情感所指涉的對象多半圍繞著兩岸關係而產生。

其中「省籍認同」對應於族群認同討論中的原生說（*primordialism*）。原初學派認為血緣、語言或行之已久的文化習慣，將形成「原初牽繫」（*primordial ties*）產生強烈且無法抹滅的情感結合（*affective bonds*）聯繫於成員間。過去研究成果表示，相對於本省閩南人，大陸省籍的民眾對於兩岸議題有相當顯著的取向，或者因為有較強的團體意識，對於政治事務存有特定的看法，政治參與程度亦較高（王甫昌，1998）。當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大部分政府和國民黨的高層職位皆由外省人士擔任，而本省人則擁有經濟活動的主控權，此種「財富與權力的不一致」使得本省與外省人士間的緊張氣氛升高（吳瓊恩，2004：177），如今此問題雖已不復存在，但「省籍問題」一詞仍多傳播於政治媒介之間。因此不同省籍背景所產生的牽繫（*ties*）對於兩岸交往議題的看法應將有所影響。

而「身份認同」則相應族群認同討論中的工具說（*instrumentalism*），其認為

一群人在特定歷史境況下共同的社會過程，將有助於建構社會性網絡與群體意識，並且促使社會中族群偏見的消除甚至族群同化，反之則負面的社會過程則將導致社會衝突沿著原初特質的界線而發生。當兩岸的爭執從制度與意識型態的對抗逐漸轉變成兩個國家、甚至兩個民族的對立，「身份認同」的形成與轉變在台灣政治學中成為極富研究意涵的問題，因此「身份認同」將會對於兩岸交往立場有所影響。

「政黨認同」是一種心理上的認同，其不須訴諸文字法律上的認定與紀錄，其起源於政治社會化的結果，是一種相對穩定的感性認同概念，過去的研究指出，選民一旦形成政黨認同，將會隨著生命週期而增加其強度（陳陸輝，2000），在「象徵政治」的範疇中，「政黨認同」一向被視為主要的基本變項討論。而在兩岸關係研究中，由於泛藍陣營與泛綠陣營在兩岸統獨立場上的強烈反差，因此「政黨認同」亦多受研究者所青睞而當自變數使用。如此，作者將之視為「感性因素」運用於民眾的兩岸經貿交往立場上，相信是毋庸置疑的。

最後就「台灣意識」而言，兩岸關係在 1990 年代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爭執從制度與意識型態的對抗逐漸轉變成兩個國家、甚至兩個民族之間的對立。吳玉山（2001）認為此中關鍵在於「台灣意識」的興起，一種和「中國意識」對立、排除中國意識的台灣意識興起。其認為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在本質上沒有相互排斥的必然性，而排他性的台灣意識，卻和中國意識（或是中國民族主義）無法相容的。由於台灣意識逐漸興起，中國意識逐日淡泊，因此台灣就越來越以一個獨立國家（而不是中國的模範省）的姿態來面對中國大陸，此造成了北京極大的恐懼與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反彈，因此兩岸劍拔弩張，台海軍事危機在所難免。⁶換言之，「台灣意識」在兩岸關係的氛圍中，吾人將其視為一種穩定發展的情感認同，依前述理論將其當作「象徵政治」中的重要因素，是得以符合感性層面的概念使用。

⁶ 關於台灣意識之討論可參見吳玉山（2001）。

因此，在感性層面的運用上，吾人認為「省籍認同」、「身份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台灣意識」等變項皆可視為感性面的重要因素。本章討論了「理性」與「感性」的理論基礎，同時並藉由研究成果的回顧，將理性層面與感性層面中的九大因素具體化於研究運用中。在下一個章節，作者將建立研究架構與研究設計，並就所推論之研究假設進行模型分析。